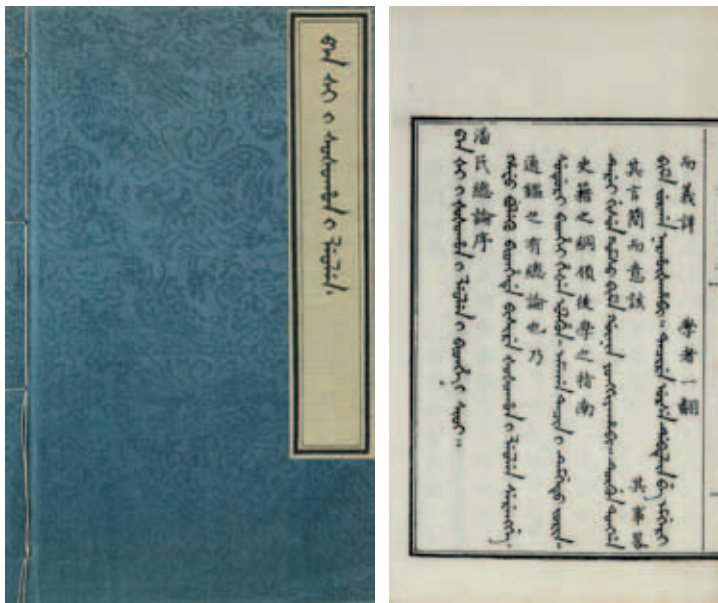




圖一 《潘氏總論》書影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原題《合璧孝經素書潘氏總論》，元·潘榮撰，清·阿什壇譯，清雍正五年武英殿刊漢滿合璧本。阿什壇即阿什坦的另一個寫法，他是赫世亨的父親。

武英殿總監造赫世亨

陳國棟

為康熙皇帝照顧西洋人的內務府成員之二

對赫世亨的生平事跡多少有一些瞭解的人，一開始免不了一定想說他是康熙皇帝的寵臣。仔細研究過他的生平後，「寵臣」兩字大概就說不出口了。因為皇帝雖然在他大病時表現出深度的關心，還肆無忌憚地開他玩笑，卻在他回到工作崗位後不久，為一件小小的過失苛責於他，終究導致了他的死亡。

赫世亨活躍於歷史舞臺的時間，前後大約有十二年的光景。最早是一六九七年，這一年他已過世的父親阿什坦（？～一六八三）因為他被授予某項官職，從而獲得了「通議大夫」的封贈。不過，赫世亨本人的

官品只是五品的員外郎，而「通議大夫」則是三品的贈銜。這或許是因為他的兩個弟弟和素（一六五一～一七一八）、鄂素（一六五二～一六九二）已在早幾年前幫阿什坦掙到過中憲大夫與奉政大夫的贈銜，往

上再升就是通議大夫了。
赫世亨出身於內務府。內務府的成員都叫作「包衣」。這兩個字是從滿文譯音過來的，意思是家人或家奴。「包衣」的身分通常終生不改，世代相傳。

他的父親叫作阿什坦，一六五二年進士，以翻譯書籍出名，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潘氏總論》就是他的作品之一。（圖一）阿什坦有三個兒子，老大就是赫世亨。老二和素，也是翻譯高手。老三是鄂素，深受康熙皇帝的鍾愛，一心一意想要栽培他，他卻在四十一歲那年英年早逝。康熙皇帝便把心思放到他唯一的兒子留保身上，幫忙留保獲得進士的

功名。赫世亨自己有三個兒子，分別是完顏保、完顏偉和完顏住。《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把完顏保寫作「王佳保」，也就是把「完顏」（Wangyan）這個姓譯作「王佳」。赫世亨過世時，可能只有完顏保已經成人。完顏偉在乾隆初年出任過江南河道總督與河東河道總督，但是他的傳記都沒有提及他的家世。完顏住的事跡不詳。

若不是一九九六年有《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一書的出版，赫世亨的事跡其實非常隱晦。雖然他的家世看來不錯，可是留有著作的家族成員都極少提到他。留保有一部《完顏氏文存》（抄本，現藏北京國家圖書館），記錄了不少的家族故事，尤其是對他自己的父親以及二伯父和素都有感情豐沛的描述，但是對大伯父赫世亨卻只用三言兩語悄悄帶過；和素的五世孫麟慶更著有插圖精美的《鴻雪因緣圖記》一書，經常提及家族過往的歷史，多次提到阿什坦、和素與鄂素，就是不提赫世亨。恒慕義的人名辭典《清代名人傳略》講阿什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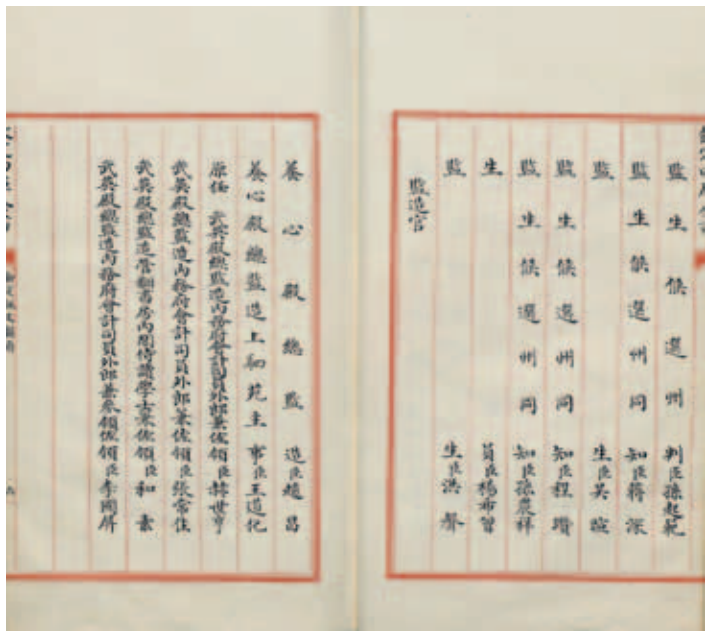
兒子，有和素，有鄂素，卻沒有赫世亨。就連完顏家族後代的景愛，費心編了《皇裔沉浮——北京的完顏氏》一書，意圖蒐羅北京完顏氏的歷史與歷代的名人傳記，但針對阿什坦三子，也僅為和素及鄂素立傳，而於赫世亨並無所記；至於在該書所附的譜表中，赫世亨雖然出現兩次，卻都被寫成「赫世亨」而未校出。

不過，凡走過的必留痕跡。《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八旗通志》……等官書在提到他的家族時，也都會提到他的名字。事實上，赫世亨在不同的時間，也分別當過鑲黃旗和正白旗屬下的佐領（牛象章京）。至於他本人所屬的旗分則是內務府鑲黃旗。

赫世亨出生於一六四五或一六四六年，總之，就是滿洲人剛剛入關君臨中國的初年。他卒於一七〇八年（康熙四十七年）。在康熙皇帝即位的時候，赫世亨大約就已經在內務府當差。但是差不多要等到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以後，他才活躍於歷史的舞臺。他的官職是內務府



圖三 北京石刻博物館 白晉墓碑 周維強提供



圖二 《御定佩文韻府》 文淵閣本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會計司的員外郎，佔了一個從五品的官缺；不過，他的主要工作卻是擔任武英殿總監造。在後面這項差使上，他做兩件事情：一件是協助皇帝從事書籍的編譯工作，另一件則是照顧在北京的西洋傳教士，他們大都提供技藝為皇帝服務。

康熙時代晚期編輯了不少類書。以完成的時間依序說來，有四十九年的《淵鑑類函》四百五十卷、五十年的《佩文韻府》一百零六卷等，皆由皇帝親自主持，因此赫世亨和他所負責的武英殿造辦處也就承擔起行政和業務支援的工作。此處且以《佩文韻府》為例作個說明。

康熙皇帝在其所撰的〈《佩文韻府》序〉一文中，指出既有的韻書不無缺點，促使他動念「博稽衆籍，著為全書」，編輯一本完備的韻書：

爰於康熙四十三年夏六月，朕與內直翰林諸臣親加考訂，證其訛舛，增其脫漏。或有某經某史所載某字某事未備者，朕復時時面諭，一一增錄，漸次成帙。猶以故實或未極博，於十月復命閣、部大臣更加蒐

采，以裒益之。既有原本、增本，又有內增、外增。將付剞劂矣，名曰《佩文韻府》。隨於十二月開局武英殿，集翰林諸臣合併詳勘，逐日進覽，旋授梓人。於五十年十月全書告成，共一百零六卷，一萬八千餘頁，囊括古今，網羅鉅細。韻學之盛，未有過於此書者也。

依據此文，《佩文韻府》一書是一邊編校，一邊刊印的。負責雕板印刷的是武英殿。皇帝要求將各樣稿件「逐日進覽」給他過目，他定稿後才進行刊刻。為此，武英殿總監造赫世亨自然忙於費勁安排，以求順事。另一方面，皇帝其實經常離京出巡，卻不讓修書的工作中止或暫停。於是，赫世亨在皇帝巡幸時通常在京師留守，而一般都隨皇帝出巡的養心殿總監造趙昌則與他保持密切的聯繫。皇帝不在京中時，沒有辦法落實「逐日進覽」的指令，但是文報三日一遞，赫世亨還是常常得寫奏摺報告進度、說明處理相關工作的情形。因為這樣的關係，遂在《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留下不少他的摺件以及皇帝下

給他的諭旨。例如康熙四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武英殿總監造赫世亨進書摺〉的報告說：

竊照本月十八日捧接諭旨，諭赫世亨：「翰林等要用《史韻》一書，朕大略記之，好像在何處見過。着爾在景陽宮書房、武英殿、養心殿、暢春園等地詳查，得獲則遣人送來。」欽此，欽遵。詳查《史韻》一書，未得，惟在景陽宮書房內有《史略》、《韻語》等書二套，以「史」、「韻」等字相同，故謹呈一套。

赫世亨沒找到皇帝指定的書，送了別本去，皇帝就叫他再細心找一找。硃批說：「朕所需者非此書，仍勤查前書，得則由邸報送來。諸漢官恐怕亦有，爾說之吳涵查尋。」吳涵是翰林院的掌院學士。從這個例子看來，赫世亨還蠻像是在做「研究助理」或秘書之類的工作。

赫世亨卒於《佩文韻府》全書殺青之前，其他的武英殿、養心殿的監造官們接替完成了全書的刊印工作。《佩文韻府》全書告成之前，由於康

熙皇帝要「先後預事諸臣，皆命列名其中。」因此，四十九年十一月上呈的名單當中，赫世亨也以「原任武英殿總監造內務府會計司員外郎兼佐領」的名義列名。（圖二）

作為武英殿總監造，赫世亨也被賦予管理西洋人的工作，與西洋人往來頻繁。作為一位身居兩方面都不是那麼容易討好的皇帝與傳教士之間的溝通者，他必須手腕靈活，言語便給，乃至於使用一些小手段。徐日昇（Toms Pereira）因此記下赫世亨的朋友紀理安（Kilian Stumpf）曾用拉丁文送給他「老狐狸」（*annosa vulpes*）這樣的綽號。這應該就是他的生存之道，是他得以獲得某種成功的原因。

他雖然很早就開始在內務府服務，而且武英殿在康熙十九年（一六八〇）時就已經設置了造辦處，但是有關他與西洋人往來的紀錄，幾乎要到十七世紀最後幾年才看得見。

最早一次是他前往廣州迎接白晉（Jochim Bouvet）。（圖三）白晉初次抵華是在一六八七年，次年進入宮廷服務。為了招募

更多的歐洲科技、工藝人才，皇帝於一六九三年派他回法國。事成之後，他搭乘商船「安菲特利特號」（*L'Amphitrite*）於一六九八年十一月初抵達廣州。一六九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康熙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康熙皇帝派往廣州迎接他的使者——劉應（Claude de Visdelou）、蘇霖（Jose Suarez）兩位神父和一名白晉記為「Hencana」的內廷滿洲官員也到達了。這位名叫「Hencana」的官員，就是赫世亨。「Hencana」的相近拼法也正是他在歐洲文獻中最常出現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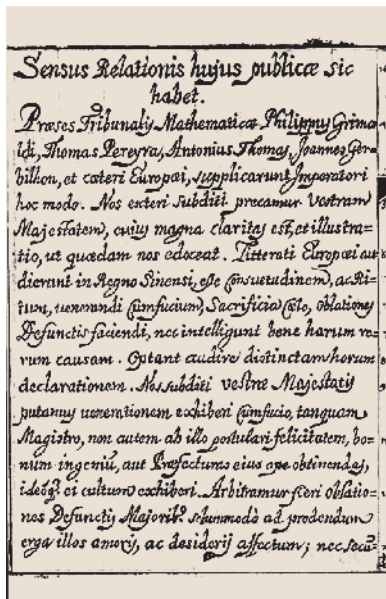
接下來他舉辦了一場顯然並不成功的音樂會。時間在康熙三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在皇帝從第三次南巡返回京城後不久。據法國學者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的研究，有一位來自宮中、名叫「uan laoyé」的人安排會音樂的傳教士們在宮中舉行一次合奏。傳教士們分別演奏直笛（*flûte douce*）、大鍵琴（*clavecin*）、中提琴、小提琴與喇叭（*besson*）等樂器。不過，才一開始，皇帝就受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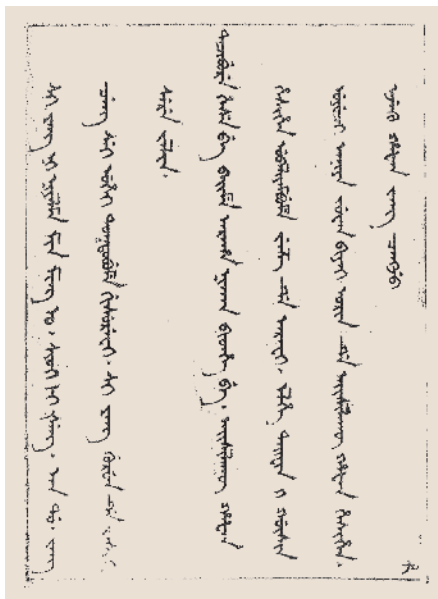
圖四 耶穌會士樊繼訓墓碑 選自吳夢麟、熊鷹，《北京地區基督教史迹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頁95
樊繼訓（Pierre Frapperie, 1664-1703），法蘭西人，1700年抵華。康熙皇帝欣賞他的醫術，巡幸各地時，經常帶他同行。他英年早逝，赫世亨受命代表皇帝致祭。



圖五 方濟會士伊大任的居留證「信票」 選自 *Sinica Franciscana*, vol. X, p. 731
康熙四十五年底皇帝下令欲繼續留在中國的傳教士必須領取信票；北京主教伊大仁（一名伊大任，Bernardino della Chiesa, 1644-1721）在次年正月十九日就已經領到了票。



圖六 1700年 *Brevis Relatio* 的拉丁文及滿文刊本
左幅約1702年刊於廣州，見 <http://expositions.bnf.fr/chine/grand/ic073.htm>；右幅約1701年刊於北京，見 Antonio Sisto Rosso, *Apostolic Legations to China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outh Pasadena: P. D. and Ione Perkins, 1948), p. 139.



了，連呼「paleao」，「paleao」（罷了！罷了！）草草結束那場難得的演出。這場音樂會的演出者（producer）「uan laoyé」，應該就是王老爺——赫世亨。因為他姓完顏，從而也被叫作「王老爺」！

與言國家之政事也。」因為是太監，所以不與他們談政事；若是內務府包衣，大概就無此顧忌。不過，從這一段話也可以看出皇帝身居九重之中，

下一年，也就是康熙三十九年（一七〇〇），在北京的耶穌會士受另一位耶穌會士李明（Louis-Daniel Le Conte）的請託，請他們為中國禮儀問題提供一個信實可靠的答案。於是耶穌會士閔明我（Claudio Filippo Grimaldi）、徐日昇、安多（Antoine Thomas）、張誠（Jean-François Gerbillon）聯名起草一份文件，就請內務府員外郎赫世亨譯為滿文，然後由主事張常住奏上。張常住也是武英殿總監造。（圖四）

不過，在稍後的「多羅事件」中，赫世亨與養心殿總監造趙昌兩人一起擔任居間人角色，為皇帝與這位教廷使臣聯繫、傳話、談判、溝通。「多羅事件」是一件中西交流史上的大事，留下來的資料汗牛充棟，而赫世亨的身影也經常徘徊於其間。由於已有他人的研究可以參考，而本文受到篇幅限制，這一部份便即略過。「多羅事件」促使康熙皇帝對傳教士們採取使用「信票」（亦稱「印票」）的方式，由內務府進行居留權的管理。赫世亨當然也參與其事。

還是需要有人和他作家常談笑。內廷除了后妃、宮女之外，當然只有太監。此外，最常出現在皇帝跟前的，不就是內務府人員嗎？康熙四十年代，除了趙昌之外，最常與皇帝應答的包衣，大概就是赫世亨了。

赫世亨在康熙四十年代上奏頗多。硃批或諭旨中常常可以看到皇帝對他的關心，或者開他的玩笑。像是在康熙四十五年八月初三日赫世亨奏摺的摺尾，皇帝就批諭說「爾之子如何了？」展現對赫世亨家人的關懷。

有時候，皇帝還開一些比較狠的玩笑。例如康熙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赫世亨奏報蒙古翁牛特王病癒，摺尾忘了寫日期，硃批說「知道了。唯未寫日期，爾學的道那裏去了！」顯然是在訓誡之外，開了個帶有諷刺意味的玩笑。過了幾天赫世亨在另一件奏摺中感謝皇帝不處罰他，又得到「真學之人！」這樣的硃批，諷刺之意味更加地濃了。

根據西方文獻，赫世亨在一七〇七年六月二十八日，也就是康熙四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由耶穌會士

（圖五）

除此之外，赫世亨平常也在皇帝及西洋人之間做些無關痛癢的聯繫，例如向已故的耶穌會士樊繼訓（Pierre Frapperie）致祭之類。（圖六）最為人提起的是：他曾奉命向多羅求取「綽科拉」。「綽科拉」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巧克力」（chocolate）。這可能是宮廷中有關巧克力的最早記載。後來廣東方面常有進口，稅則上叫作「知古辣」。赫世亨也向宮廷中的西洋醫生鮑仲義（Joseph Baudino）詢問巧克力的功能與配方，得知它含有「噶高」（可可，cocoa）、「瓦尼利雅」（香草，vanilla）、「阿尼斯」（茴香，anise）……等成分，但不是藥，沒有療效。皇帝就此不再對巧克力感興趣。

不過，不用替康熙皇帝煩惱。反正他是個多方面有興趣的人，他也得排遣沉悶的時光。他會找人開玩笑。雍正皇帝在他所編的《庭訓格言》中，記錄了康熙皇帝對身邊太監的看法時說：「即朕御前近侍之太監等，不過左右使令，家常閒談笑語，從不

蘇霖施洗，取教名「伯多祿」（Petrus Peter），成為天主教徒。皇帝方於五月二十二日南巡回到暢春園，未知他是否被告知赫世亨受洗的訊息。湊巧的是打從同年六月起，赫世亨就生病不能視事，武英殿修書之事，改由另外兩位總監造李國屏和愛保辦理。皇帝在初六日那天起程離京，出塞巡幸。皇帝出京後接到的奏報就已經改由這兩個人具名，沒見著赫世亨的名字，於是在他們的奏摺上寫下「赫世亨怎麼樣了，還在麼？」的批語。

赫世亨這一病，病了四十多日。皇帝在每隔數日與李國屏、愛保的通信中，經常詢問赫世亨病情的發展，乃至於交待幫他更換醫生、指示他調理的方法，賜給他美食。從《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書中所收錄的奏摺、硃批和諭旨，可以看出皇帝對這件事情很感興趣——如果不說他很關心赫世亨的話。皇帝還派了他的兒子王佳保（完顏保）和女婿常明分別去探視他。當時，這兩個人可能都扈從皇帝出巡到熱河。到了赫世亨病情完全好轉時，皇帝就再度和他開起玩

笑。七月十一日，李國屏、愛保在奏摺上提到赫世亨自稱猶如「螻蟻」，硃批把這兩個字換成了「玉螭」。

到了七月十七日，李國屏、愛保在奏摺上詳述了赫世亨病情穩定好轉的情況，得到硃批說：「聞赫世亨已大癒，未盡報朕言，待朕回宮，斷不寬宥，必將赫世亨交與其妻掐死。」三天後，赫世亨透過李國屏等的奏摺回奏道：「皇上聖明，且學識淵博，即係戲言，亦無不成章。奴才亦欲得一二句，以博皇上一笑，確實不能。惟有我妻，近來服事奴才稍累，若見此旨，誠恐撒嬌，故匿旨未告訴。」（按、「皇上聖明」原作「皇父聖明」；「撒嬌」原作「撒驕」）這一回得到的硃批是：「匿旨不告訴，該當何罪？着問明赫世亨奏來。王佳保二十日到，詳細問之，聞彼甚好。赫世亨若不痊癒，王佳保可回來耶？王佳保雖非赫世亨之子，但應支持照看數日矣。朕到宮後，看視赫世亨，再交付其祖母殺之。」這一段漢文翻譯被原譯者弄錯了。白新良就曾指出，「祖母」兩字應該譯成「妻子」才

脫離這個測繪小組。這件事他當然沒有事先告知皇帝，也沒有告知負責居間轉達的赫世亨。

康熙四十七年四月十六日，白晉、雷孝思、杜德美離京西行。兩個月後，行至陝西省神木縣，白晉就假裝病重停下來養病；數日後，地方官安排送他回北京，八月初三日到達。赫世亨在次日上奏，轉述閔明我等人所稱白晉係摔馬受傷，由地方官派人護送回京的報告。赫世亨並且說在京西洋人為此向皇上謝恩，然後再加上他自己的親眼觀察，說：「看視博津（白晉），氣色甚好，傷已痊癒。」沒想到皇帝得知赫世亨的處置後，勃然大怒，寫下這樣的批諭：

博津起初不願去。若其臉色照常，則裝病還矣。若返家後痊癒，則伊為傳教之人，行此不體面之事，可謂足矣。若是病癒之日自行趕回，則其罪雖大，尚可垂憫。對此眾西洋人謝恩，朕有所不解。爾如此碌碌轉奏，即應革職，執送慎刑司議罪。爾張口講禮儀，不知此何書所載。

康熙皇帝當時駐蹕熱河，行圍塞外，

對！讀者亦當同意「王佳保雖非赫世亨之子」一句若是改作「王佳保既為赫世亨之子」，文意也比較順暢。

七月二十三日，赫世亨再透過李國屏等人奏報：「匿旨不傳，雖必有罪，但係奴才家事，諒皇上斷不治奴才以重罪。故奴才現在告訴，我妻設或萬一與我嚷鬧，我病才大癒，能忍受與否，亦難逆料，故匿不告訴是實。再過數日，奴才力強，酌情告訴，彼時其奈我何。」到了月底，赫世亨透過李國屏等報告他要到西山一帶鄉村待一陣子，皇帝准了，而且說：「為妻所迫，避之城外，理所當然，否則赫世亨又死矣。」到底赫世亨與他的妻子之間有何微妙之處，資料實在不能讓我們清楚知道，倒是康熙皇帝一付了然於心的模樣。

當然，赫世亨沒有被他的妻子掐死。他先去西山一帶待了近一個月，回到京裡不久，又去了。往後沒有音訊近一年之久。《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再度見到他的奏摺是他在康熙四十七年七月初九日奏上的進書摺，顯然他已回到武英殿總監造

而隨行的皇十八子胤祚卻得了急病（腮腺炎），皇帝的心情不佳；稍後皇帝痛心疾首地廢掉胤祚皇太子的身分，此時恐怕已經為他的人品行事憂煩不已；更何況繪製地圖是皇帝的一大心願，而老臣赫世亨竟然看不出來白晉是作假！於是批語落筆極重。赫世亨的弟弟鄂素曾經當過慎刑司郎中，執送慎刑司的後果如何他當然知曉。

八月九日，赫世亨一收到批回的奏摺之後，立刻召集在京的西洋人，並且要白晉寫一奏摺承認自己的兩個錯誤：一是沒有在神木縣待命請旨，就自行返京；二是病癒之後沒有趕回工作前線，反而返回北京。然而白晉的自白寫得很慢，當赫世亨不得不在八月十日送出奏摺時，白晉還沒寫好，趕不上文報，皇帝沒有及時看到。後者在赫世亨的摺子上，冷冷地寫下「未寫遣返博津與否，多寫話何用。」這樣的文句。從此以後，我們再也看不到赫世亨的奏摺。徐日昇記錄他在八月二十八日去世，距離他最後一次具摺只有十幾天。他是怎麼死

的崗位上。然而這是一個皇帝沒有開玩笑心情的時間，赫世亨不久就在劫難逃。依據徐日昇等人的資料，他在一七〇八年十月十一日（康熙四十七年八月二十八日）過世了。

他的死看起來頗為突然，但事出有因。康熙晚期命令西洋傳教士分赴全國各地測繪地圖。正式開始的時間為康熙四十七年四月十六日（一七〇八年六月四日）。皇帝命令法國傳教士白晉、雷孝思（Jean-Baptiste Régis），杜德美（Pierre Jartoux）和日耳曼神父費隱（Ehrenbert Xavier Fritelle）等人，從長城開始測量，而在次年一月完成一圖。其後重組人員，測繪他處。整個測繪工作在康熙五十七年完成，完成的作品統稱為《皇輿全覽圖》。測繪地圖必須前往四處偏遠的地方，生活供給較差，而且可能還遠離文明。白晉不想去，他想留在北京以便繼續他計畫中的《易經》研究，因為他認為中國古代經典當中隱藏著天主教的因子，值得將其揭露出來。因此，基於個人私心，白晉一開始就計劃以墜馬受傷為藉口好

的？有沒有被送交慎刑司？通通沒有資料可說。不過，天主教史學者魯保祿（Paul Rule）說他死得多少「有些丟臉」（somewhat in disgrace），恐怕正是實情。這同時也說明了在家族文獻之中，他極少被人提起，就是提起，也欲說還休的根由吧。^⑤

作者為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參考書目

1. 景愛，《皇裔沉浮——北京的完顏氏》（北京：學苑出版社，二〇〇一）。
2. 王利器，《李士楨李煦父子年譜》（北京：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三）。
3. 關雪玲，〈康熙朝宮廷中的西洋醫事活動〉，《故宮博物院院刊》，二〇〇四年第一期。
4. 白新良，〈已刊康熙朝滿漢文奏摺正誤〉，《清史研究》，二〇〇三年第四期。
5. 陳國棟，〈武英殿總監造赫世亨——「禮儀之爭」事件中的一位內務府人物〉，《兩岸故宮第三屆學術研討會：十七、十八世紀（一六八二—一七二二）中西文化交流」會議（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五至十七日，故宮博物院）論文。
6. 秦國經〈十八世紀西洋人在測繪清朝輿圖中的活動與貢獻〉，《清史研究》，一九九七年第一期。
7. 楊珍，〈繾綣父子情——康熙皇子生病之後〉，《紫禁城》，一九九五年第二期。